

课题批准号：BZ23ZD016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新模式运行机制
调研报告



项 目 类 别	2023 年度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学 科 分 类	党史党建
课 题 名 称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新模式运行机制研究
项 目 负 责 人	雍兰兰
负责人所在单位	四川农业大学
填 表 日 期	2023 年 10 月 28 日

1 导论	3
1.1 课题背景与意义	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1.3 研究目标	9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9
2 联村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概述	10
2.1 联村党组织的概念	10
2.2 联村党组织的基本类型	10
2.3 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概念	11
3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的案例概述	12
3.1 联村党组织案例对象的选择依据	12
3.2 联村党组织案例对象的运行概况	13
4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运行优势、具体机制与主要问题	16
4.1 联村党组织运行的突出优势	16
4.2 联村党组织运行的具体机制	18
4.3 联村党组织运行的主要问题	19
5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优化路径	27
5.1 加强组织准备机制的充分性	29
5.2 加强资源整合机制的针对性	31
5.3 加强议事协调机制的联动性	32
5.4 加强联习共训机制的持续性	34
5.5 加强利益共享机制的协调性	35
5.6 加强运行保障机制的完备性	37
6 参考文献	38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新模式运行机制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雍兰兰;宁娜;曹昌欢;张晓宁

摘要:近年来,在巴中市部分农村地区,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探索出了联村党建这一新型党建模式,组建了一些联村党组织,这支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界对联村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机制尚未开展,亟待学术界予以会议和探讨。文章在对联村党组织的理论内涵、时代价值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针对联村党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有关路径。

关键词: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

1 导论

1.1 课题背景与意义

1.1.1 课题背景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是农村党建工作的起点和基础,也是整个农村基层组织配套建设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需要“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优化党组织设置”。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当前,乡村振兴处于全面推进阶段,巴中市部分村落的居住形态和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小部分村级党组织呈现出组织涣散、组织功能弱化、产业提升乏力、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急需寻求新的发展支撑、筑强组织堡垒、凝聚发展合力。村级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肩负着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重要职责,需主动担起时代的重任,通过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等途径,加强组织建设,增强组织功能,提升组织战斗力,把村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党中央解决部分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宏观背景下，巴中市各地村级党组织在党建引领跨村治理过程中探索出了联村党组织这一新型组织形态，它打破了传统村级党组织就村抓村的路径依赖和地域藩篱，将村级党组织与其他党支部联建为一个新的党支部，使分散、异质的党组织组建为发展的联合体，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助力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供应了新的组织资源，取得了较好的治党治村成效。然而，随着巴中市农村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部分联村党组织不能完全适应新环境、新任务，出现了“联而不合”“合而无效”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切实提高巴中市联村党委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1.1.2 课题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有利于巴中市丰富和发展农村基层党建理论。通过对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从理论层面上深化认识党建引领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在把握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组织设置、制度规范等方面形成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完善党建引领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本研究运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解释联村党组织的运行逻辑，将党建引领目标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机结合，以联村党组织发展实际为基点，深入剖析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现状，科学总结联村党组织运行有效的新鲜经验，分析其运行机制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丰富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理论、拓展了党建引领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理论，这对解决部分村级党组织堡垒作用发挥不强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二，本研究有利于巴中市进一步把握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规律。对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认识联村党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农村基层党建规律。本课题以系统的视角分析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建设实践的得失，摸索和总结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建设的内在规律，为优化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提供实践支持，进而努力把握联村党组织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加深对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规律的认识。

1.1.2.2 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有利于为改善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运行状况提供一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切实提高联村党组织运行实效是联村党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有操作性、可复制的运行机制。当前，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组建及其运行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相关机制体制还不够健全完善。本课题立足联村党组织运行实际，对其运作模式进行考察，

分析其优劣得失，将成功经验加以归纳总结，同时针对其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根据相关理论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希望能够将找出有操作性、可复制化的运行机制，为改善联村党组织运行无效问题寻找出路，为规范联村党组织运行建言献策。

第二，本研究有利于为加强巴中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一些实践参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是农村党建工作的起点和基础，联村党组织的组织形态是巴中市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契合了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问题导向。本课题着眼于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建设的实际，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借助鲜活案例，从实践层面找准影响和限制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突出问题，探索出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的举措，有利于加强乡村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提供更多实践参照。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新时代，联村党组织肩负着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的历史使命，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模式，更是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三化”问题的迫切需要。目前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组建及其运行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学界对联村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也尚处于探索初期，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集中如下：

联村党组织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种新的实践样态，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肇始于 21 世纪初，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初期。2003 年，《学习论坛》第八期刊载了作者袁建伟发表的《论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一文，该文是国内学者首次提及创立“联村党组织”的期刊文献。随后，此后，我国许多学者先后在该领域展开了研究。截至目前，以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平台为载体，以“联村党组织”、“联村党支部”、“跨村联建”为主题不设时间段检索，剔除不相关期刊文献，共检索到 26 条结果，根据发表的年度趋势分析，相关研究自 2006 年开始，于 2019 年开始稳步上升，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在超星全文电子图书（汇雅书世界）、超星读秀学术搜索等平台检索图书发现，专门研究联村党组织的著作暂无，相关研究散见于农村基层党建的著作中，相关著作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编写的《基层党组织如何提升组织力》（2019 年版）；中央党校党建部编著的《基层党建工作手册》（2019 年版）；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组织》（2020 年版）。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以来，部分学者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创新农村基层党的组织设置，联村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样态，在农村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如下：

第一，关于联村党组织的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学界对联村党组织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联村党组织的内涵界定、联建目的、联建范围、联建本质与职责等。其一，关于联村党组织的概念界定，学者们普遍赞同联村党组织是在保证“原有行政区划和自治主体情况”（陈晓宏，2018）不变的前提下组建的创新性党组织。即联村党组织是在原有村级行政区划、村民自治主体、财务管理体制、目标考核奖惩、村干部职数配置和经济待遇“五个不变”前提下（崔永龙，2008；张宇，2013；杜志雄、赵黎等，2022）组建的党组织，是一种切合地区实际需要的基层党建创新性实践（赵黎，2022）。其二，关于联村党组织组建的目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组建联村党组织是为了寻求村庄的新发展而展开的联合发展行动（田毅鹏，2022），其目的就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进而推动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董江爱、张瑞飞，2020）。其三，关于联村党组织的联合范围研究，从当前实践开展来看，村民、村情和村域等地理位置分布是基层农村党组织联合的范围（咸鸣霞、周义程，2022）。其四，关于联村党组织的本质研究，认为联村党组织的核心特质是村庄发展逻辑与协同化党建逻辑的嵌入耦合（李想、何得桂，2022）。其五、关于联村党组织的职责，认为联村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围绕乡村振兴，研究制定区域内村庄规划、产业布局、管理服务、公益事业等重大问题，并协调督促各村共同抓好组织实施（陈宝玲、陈美炎，2022）。

第二，关于组建联村党组织的是生成逻辑。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视角研究联村党组织的生成逻辑。其一，农村基层党建视角认为农村基层党有限的组织环境适应能力与农村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之间的不对称是组建联村党组织的发端（殷焕举，2021；赵洁，陶忆连，2021），因此破解传统农村基层党组织部门壁垒、条块分割、地域限制、空间覆盖不足等问题，需要打破原有的职域和地域的界限并进行边界的重组和调整，进而促进基层党建水平的整体提升（梁新芳，2021）。其二，乡村治理视角认为乡镇行政资源配置不足、编制紧张，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任务不断加重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胡国富、周松强等，2013），导致“村级治理无主体”现象的产生，因而需要借助“联村制度”打破科层制“块块”的功能分割（冯川，2016）。

第三，关于组建联村党组织的意义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和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两个视角论证了联村党组织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中所具有的功能与价值。其一，从农村基层党建视角来看，联村党组织有助于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加强、改进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联村党组织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支部同构和功能调适，能够有效激发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转化为基层党组

组织建设的实践载体，重塑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嵌合力（李想、何得桂，2022）；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尹学朋、任中平 2008）；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之路、服务之路（文丰安，2021），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王美英、2022），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启示（李强，2022）。其二，从农村社会治理视角来看，联村党组织有助于推动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联村党组织为党建嵌入治理提供了最充分的组织支撑（孙林 2021）和制度基础（何得桂、刘翀，2022），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产业治理提供规则与秩序（曾薇，2022），构建了以“联村党组织治理”为基础的组织架构，整合了各类社会组织，实现了资源要素共享、发展优势互补（苏秀瑞，2015；张利萍、2019；何得桂，韩雪，2022），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力量开展协同治理，激发了基层社会的内生动力（陈宝玲、陈美炎，2022）；是推动治理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赵黎，2022），推动了农村发展升级（岳奎、张鹏启，2022）。

第四，关于联村党组织的类型研究。对已有研究梳理发现，学者们普遍根据联建的主体和目的为标准对联村党组织进行划分。其一，以联建主体为标准划分联村党组织。联村党组织涉及村级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根据联建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村村联建型、村企联建型、村居联建型（张宇，2013）、村社联建型（李勇华，2014）、城乡联建型（徐根义、蒿艾莉，2010）等五类。其二，根据联建目的为标准划分联村党组织。联村党组织涉及不同利益主体，根据联建目标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强村带动型（瓦标龙，2020）、产业牵引型（咸鸣霞、周义程，2022）、统筹整合发展型（杜志雄、赵黎等，2022）等三类。此外，也有学者综合考虑联建村的地域特征、产业特点、发展方向等因素，将联村党组织划分为：园区发展型、社会管理型、村企和谐型、区域产业型、政策推进型、村社融合型等六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2013）。

第五，关于联村党组织建设的问题研究。目前。学界研究认为联村党组织的建设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发展水平方面，主要表现为联村党组织实践发展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赵黎，2022）。二是在运行机制方面，主要表现为联村党组织在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则略显单薄，行政体系内存在制度化、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问题（刘成良，2018）。三是在关系协调方面，主要表现两方面，一方面联村干部不能协调上级安排的中心任务与实际需要的工作任务，进而出现关系不顺畅（王灿灿，2016）、官僚化趋势，导致其本身所具有的体现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日益被边缘化（田先红，2019）；另一方面表现在联村党组织可能存在侵害村级权利结构导致的合作困境问题。（李勇华，2014）。

第六,关于联村党组织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机制构建、方法的改善等方面展开论述。一是机制构建方面,从联村党组织的特殊结构分析,认为完善机制是保障联村党组织的前提(王和余,2011),建议从完善联村党组织工作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以及议事机制(曾薇,2022)、打造联建利益共享机制(胡华,2022)等基础性机制入手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农村社会发展、化解矛盾纠纷、深化农村改革中的核心作用。二是方法改善方面,首先在平台建设方面,建议通过搭建联合发展平台(高强、孔祥智,2020)、创新平台载体(裘曙洁、张亚君等,2018)等方式解决联村党支部制度不健全及组织活动难度大等问题;其次在理顺职责关系方面,建议联村党委要理顺自身与各党支部以及村委会的关系,明确自身的职责所在(丁岚,2019);最后,建议要以合适的合作制度为基础,把握原则,从实际出发,即根据村庄具体发展实际和合作意愿开展多层次、跨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叶婧、陈刚等,2018)。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专门对中国农村联村党组织的研究暂付阙如,与本课题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党组织间的区域联系、党组织的环境适应性、党组织与其他组织合作的意义等方面。一是在党组织间的区域联系方面,认为党组织具有提供跨地域的联系的功能,从而可以把不同层次的联系整合到一个多层次的政治体系中(Saglie, 2020),因此可以把党组织作为多层次政治系统中的沟通和协调工具(Aarebrot、Erik, 2013)。二是在党组织的环境适应性方面,认为党组织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新联系来创新合作网络,以此适应组织环境的变化(Brill、2017; Hjaltadóttir、Makkonen, 2020)。三是党组织与其他组织合作的意义方面,认为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实际上具有跨越公私鸿沟的密切联系(Farid、Song; 2020),二者建立合作关系能够应对治理危机(Christensen、Ma; 2020)、提高发展绩效(Krishna, 2003 年)、实现组织目标(Panday, 2018)。

1.2.3 研究述评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从不同视角对联村党组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仍处于起始阶段,专门对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第一,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化。从概念研究来看,一方面在联村党组织概念界定上仍有总结不到位的地方。从运行机制研究来看,没有进一步阐释联村党组织是如何在党的引领有效运行的。

第二,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学界对联村党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

和农村基层党建两种视角，两种研究视角针对联村党组织突显的现象和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缺乏从政党建设学上政治学、组织学有机融合的宽广视角。

第三，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对已有研究分析发现，既往研究多停留于具体、微观、个案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及现实感，对优化部分联村党组织的运行也提出了精准的对策建议，但缺少巴中市为案例研究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文章。

1.3 研究目标

本课题研究以巴中市联村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其运作和成效。重点围绕“联村党组织是什么”“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是什么”“联村党组织运行实效如何”“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还存在那些问题和不足”“如何进一步优化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等关键问题，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展开集中研究，以期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具体而言，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进一步界定联村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概念内涵。二是立足于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运行实效，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形成切合实际的优化原则与路径，为各级政府的决策部门提供有益建议。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课题以“联村党组织是什么——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是什么——联村党组织如何运行——联村党组织运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升联村党组织运行效能的优化路径”为逻辑框架渐次展开。首先以四川省巴中市联村党组织为例，具体分析联村党组织得以成立的原因即背景，重点分析联村党组织的组建过程，包括这种基层党建方式组织架构以及具体运行实践；其次进一步分析联村党组织的运行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并总结其经验；最后，根据相关运行实际指出联村党组织现实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1.4.2 研究方法

1.4.2.1 文献研究法

本课题使用文献研究法，旨在全面搜集、整理现有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读和研究，掌握联村党组织的研究程度和学术前沿，注重对联村党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进而找出研究空间，进一步丰富农村基层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具体而言，本课题借鉴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涉及四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讲话、文献汇编等；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发布的相关制度及政策

文件；三是与本课题相关的期刊、报刊、书籍等；四是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的相关制度文件。

1.4.2.2 归纳演绎法

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是相辅相成的，反映了因果关联的一般与个别的逻辑辩证关系。本课题研究将归纳—演绎结合，研究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用归纳法概括出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一般规律；用演绎法分析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经验教训。从而深化对联村党组织的建设规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点的认识。

1.4.2.3 案例研究法

案例分析法是对有代表性的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并获得总体认识的一种科学方法，具有理论建构、简明易行、可感有效等优势。本课题研究选取四川省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典型案例展开实例研究，挖掘联村党组织运行的相关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剖析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而指出联村党组织运行规律及其运行机制。

2 联村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概述

2.1 联村党组织的概念

从管党治党的维度来看，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秉持着属地管理和属性管理的基本策略，地域建党和功能建党是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两种基本方略。所谓地域建党，是指以地理行政规划统筹设置的党组织；所谓功能建党，是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设置的党组织。联村党组织正是为适应农村形式变化与协调农村工作重心而探索出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组织形式。联村党组织是指在坚持原有行政划分、自治主体、集体经济资源权属的情况下，根据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共同进步的总体思路，以地域相邻、资源相融、产业相近、利益相关为原则，把村级党组织与其他党组织联合起来建立的抱团式功能性党组织。相较于传统以行政村设置的党组织，联村党组织属于非建制性党组织，由上级党委划定隶属关系，不增加编制和职数，不增加行政机构，不承担具体行政事务，是村级党组织的延伸和补充，主要负责联村区域间产业共营、人才共育、文化共兴、生态共创、组织共建五大内容。

2.2 联村党组织的基本类型

联村党组织的联合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形式各异的联村党组织普遍表现出不同的联建背景、联建目的和运行模式，对联村党组织进行类型划分是分析不同类型联村党组织共性运行机制的基本前提。联村党组织是多元主体之间摒弃资源私有化思路并谋求合作促成的联合行动，在具体实践中衍生出多种类型，依据不同主体参与联村党组织资源整合的方式为标准可以将联村党组织划分为：村村抱团型、村企牵引型、村社融合型三类。

村村抱团型联村党组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村级党组织以地理相近、产业相似、资源互通等一体化前置要素为联结点组建的党组织,该类型联村党组织主要以空间距离的便利程度建立联合关系,对一定区域内村级党组织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适配性较高,包括强村带动型联村党组织和弱弱互助型联村党组织两种基本类型。强村带动型联村党组织就是以引领力强、组织力强大、集体经济雄厚的村级党组织协助引领力微弱、组织力绵软、集体经济薄弱的村级党组织;弱弱互助型联村党组织就是一些未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村级党组织,为解决自身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积极寻找与其他村级党组织合作的缝隙,通过多村捆绑合作实现联村区域的联合发展与合轨运行。

村企牵引型联村党组织是在村级党组织与一个或多个企业组织建立“双向借力的平等合作关系”^①的前提下,凭借村企利益共同体联结关系,企业组织依托个体产业发展链条牵引村级党组织以及再组织化的村民参与产业建设,村级党组织整合自身党建资源与集体经济资源嵌入企业组织,以村企双方互融互嵌实现“以企强村、以村促企,村企双赢”的组织样态。村企牵引型联村党组织是企业组织转型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形式,此类型联村党组织不改变原有企业经营权和村级党组织集体经济所有权,适配于那些有一定区位优势 and 可开发资源的村庄,即适用于具备产业开发或产业发展等基础条件的村庄。

村社融合型联村党组织是指村级党组与居民委员会、驻地机关事业单位、合作社、基金会等强社会服务性组织联合成立的党组织,这种类型的联村党组织往往偏向于那些谋求村社过渡的村级党组织,即该类村级党组织与联建单位一般超越了寻常建制村与社会的边界关系,普遍拥有更为密切的利益关系、更为相似的生产生活、更为便捷的道路交通,把社会组织 and 行政村组建成联合党组织的远景目标是使本建制村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益最终达到治理单元上移的效果。村社融合型联村党组织是推进城乡集聚效应生成的过渡性组织形态,是城乡关系调试的历史缩影。

2.3 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概念

对机制的有效凝练是深入认识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逻辑起点。“机制”是个舶来语,源自古希腊,滋生机械学领域,系指机器的零件关系构造与工作原理。随后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学科得到广泛运用,借以隐喻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律动关系与运行机理。再后来,“机制”一词被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被政治学、法学、社

^① 邓正阳.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6):53-65.

会学等学科广泛采纳,用以描述组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按照一定向度相互联系、协调运作的过程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也接纳了这一概念,提出了诸如“支付机制”、“生产机制”等概念。综观之,尽管自然社科和人文社科对机制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强调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运行过程和方式,是一个动态性、复合性、关联性、工具性相统一的概念,特指“为实现某一功能、发挥某种作用,事物或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协调运行的原理、方式和过程。”^①

“运行机制”的概念是在“机制”的基础上予以附加的,它更为强调客观事务运行过程的动态性与复合作用性,是指“在一定的组织体系中,行为主体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和各具特色的行为模式。”^②依据运行机制的内涵,可以把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界定为:为确保联村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惯习轨道,是联村党组织各构成要素间的具体工作程序、制度安排等一系列运行方式的总和。具而言之,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主要含义包括:第一,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是指那些对联村党组织运行过程起支配和调节作用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总称;第二,各构成要素间结构有序衔接、功能相互耦合是其组织功能发挥的基础;第三,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是受内外影响和制约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3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的案例概述

3.1 联村党组织案例对象的选择依据

实证分析离不开兼具代表性与生动性的案例,选取恰当的联村党组织案例是本研究探讨的支撑点。虽然随着巴中市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村党组织创新工作也取得蓬勃发展,巴中市也涌现出一大批不同运作实效的联村党组织,但是为避免选择低代表性案例影响研究走向与结果,依照已有文献成果和专家访谈的结果,本文在选择案例时遵循以下三个筛选标准:

一是联村党组织案例具有清晰属性。剖析联村党组织运行的主要做法,洞察其共性化机制及其问题的过程中必须筛选与对应联村属性特征一致的联村党组织,这是联村党组织案例选择的基本和前置标准,避免所选案例出现类型模糊而难以区分的情况,确保案例与研究主题的一致性、适配性。二是联村党组织案例具有代表性。“代表性”主要囊括三个方面,即“持续化”、“制度化”和“典型化”。首先是持续化,由于本研究聚焦联村党组织的运行机制,需要窥察联村党组织的运行过程,这意味着所选案例必须保证运行周期相对完整、运行

^① 张序,张霞.机制:一个亟待厘清的概念[J].理论与改革,2015,No.202(02):13-15.

^② 熊光清,蔡正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内涵——结构、规则和关系层面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1,No.311(06):1-10+195.

时间相对长久，为此，本研究将选择运行时间至少达到一年以上的联村党组织。其次是“制度化”，选取制度化程度较高的联村党组织案例在进一步佐证联村党组织案例持续性运行的基础上凸显了其运行机制的常态化及规范化。最后是“典型化”，所选联村党组织案例尽可能是被主流媒体报道和学术界认可的典型案例。三是联村党组织案例资料收集具有便利性与真实性。深入研究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必须获取全面详实的一、二手材料，并且使得一、二手资料能够交叉互证。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的联村党组织案例来源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主流媒体发表的新闻报道以及各级政府网站发布的通知、通告等信息来源取得丰富的二手资料，另一方面是借助课题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取得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综合上述案例选择标准与实际调研情况，本研究选取四川省巴中市曾口镇片区联合党委下设的三江镇联村党组织作为村村抱团型联村党组织样本。

3.2 联村党组织案例对象的运行概况

3.2.1 曾口片区三江镇联村党组织的基本概况

三江镇联村党组织隶属巴州区曾口三产融合发展片区联合党委下的二级党组织，是在贯彻落实《中共巴中市委组织部关于优化片区基层党组织设置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巴市组通〔2022〕10号文件）精神过程中组建的以行政村为主的村村互助型联村党组织。三江镇立足本镇“三河”隔“四岛”的具体地域环境，结合各村具体资源情况，科学划分3个功能片区，成立3个联村党组织，即以明月寺村、大兴村、天马山村为成员组建天马粮油农旅融合联村党组织；以龙门村、双寨村为成员组建龙门农副产品基地联村党组织；以为民主村、中兴村、三江口为成员组建三江水乡文旅发展联村党组织。三江镇联村党组织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遵照2022年7月28日曾口三产融合发展片区联合党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巴州区曾口三产融合发展片区联合党委运行规则》执行，运行成果惠及全镇8个村（社区）群众。

3.2.2 曾口片区三江镇联村党组织运行的举措

三江镇联村党组织通过科学设置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定位、达成议事协商共识、推动监督运行与监管等四方面实现组织有效运行。

一是科学设置组织架构。三江镇联村党组织是在不改变村居建制、地域边界、群众身份、人员隶属、债权债务的原则下，以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通、产业相近为标准建立的，在组织管理上按照功能型党组织管理，协同推进产业发展、纠纷调节和为民服务等事项。具体来说，跨村联建的联村党组织由三江镇党委协商，从乡镇中选派一名党委委员兼任联村党组织书记，涉及村的党组织书记兼任委员，按照“领导包篇、干部驻村、两员指导”分块分

享推进，形成了以三江镇党委牵头总揽、联村党组织书记负责、农技入户指导的工作格局。

二是明确职责定位。三江镇联村党组织从一体规划、产业协同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和治理共抓联促等四方面规定了自身主要职责。一体规划上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统筹力量、协调各方作用，综合考虑不同建制村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系统科学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组织建设、产业建设等方面工作计划，推动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产业协同发展上要求发挥中省财政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相互示范带动作用，采取集体经济跨村联营、建立产业园、完成产业链等方式培育具有品牌影响力、竞争力的产业群组，推动产业抱团发展。资源集约利用上要求通过网络服务和实际调研的方式搜集、厘清三江镇联村党组织的资源偏好与服务诉求实现联建村庄资源供需平衡与互补，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心村搭建金融综合服务站扩大联村党组织服务半径。治理共抓联促上要求联村党组探索建立跨村联动协作机制，整合联村区域治理专干、法律顾问、网格员等力量，协同完成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生态环保等底线任务。

三是达成议事协商共识。三江镇联村组织意识决策上坚持集体领导、民族集中、个别云南、会议决定的原则，对事关联村党组织的重大决策保持充分协商，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三江镇联村党组织从协商决策的内容、主体、形式、表决方式、流程等方面均做出具体规定，协商决策的内容方面规定凡涉及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村党组织发展规划、审议向上级党委请示报告事项以及研究讨论其他重要事项均归属协商议事的范围；协商决策的主体方面规定三江镇党委、联村党组织书记、委员及镇级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列席；协商决策的形式上规定联村党组织协商议事一般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联席会议通常每季度召开一次，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协商决策的表决方式上规定可以采用口头、拒收、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议题通过的标准为赞成票超过到会人员半数；协商议事的流程上规定一般按照确定议题、会议通知、会前准备、集体讨论、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决议实施的程序决定。

四是推动监督运行与监管。为保障运行成效，三江镇联村党组织采取三步工作法，第一步制定组织规划，即在每年年初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列出年度任务清单；第二步建立监督和容错纠错机制，一方面三江镇联村党组织需定期向曾口片区联村党委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和相关单位参与共驻共建情况，另一方面鼓励先行先试，主动作为，同时要坚持有形有态、有效管用；第三步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一方面联村党组织运行成效与联村党组织干部考核挂钩；另一方面加强考核结果反馈，强化考核结果分析运用，镇纪委牵头成立专项督查组，加大督查问效，并将其作为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依据。

3.2.3 曾口片区镇联村党组织运行的成效

村村互助型联村党组织是镇域范围内推进资源调整的重要方式，旨在以村党组织的通力合作解决部分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乡村产业振兴内生动力不足、基层治理水平不高”等问题，三江镇联村党组织灵活运用组织力量，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动力、彰显社会治理效能打下“三江样板”。

一是充分凸显了三江镇党建引领作用。三江镇联村党组织发挥党建联盟优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组织功能，搭建起合纵连横的组织架构模式。纵向上，以区委常委为统领、乡镇党委为主导、村党组织为基本单位、特色功能联村党组织为操作点，构建起四级联抓、层层落实的组织体系；横向上，各功能区联村党组织以中心村设立组织阵地，并以村党组织书记兼任副书记负责执行各项联村事宜和任务对接，同步有效联结三江镇连南农商银行、巴中市秦巴田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社会组织，推动村党组织与其他组织互帮互助，形成聚合力量，有效化解了部分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

二是激活了乡村产业振兴动力。三江镇党委以联村党组织“政策引”，以巴中市金宏、圭地械贤农业展有限公司等“龙头带”，以禾海蔬菜专业合作社、巴中市野蕊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利益联”，汇聚乡村产业振兴多级力量，实现了以企兴乡，产村融合，激发了基层组织产业振兴“内生力”。目前，农业方面，在龙门农副产品基地联村党组织的带领下，2022年年末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600亩，大豆净作420亩；成功引进3家企业，建成3000头生猪养殖场、300头肉牛养殖场、500亩羊肚菌生产基地各一个，有效带动周边30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达3000元以上；农旅方面，在天马粮油农旅融合联村党组织组织下成功召开2场“农文旅”招商推介活动，打造出三江明月原乡民宿、天马山太极山水壹号营地等农旅品牌，联村区域内农旅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三是彰显了社会治理效能。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和主体的多元性呼唤出更具时代特色的党建联盟治理共同体，在推进联村党建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三江镇联村党组织一改以往各自为政的村级治理模式，以联村党建联盟拉动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诉求上，以深入开展群众诉求大起底工作为抓手，联村区域内全面打扰问题，搜集诉求521件，大力推行“四议四调整四评”，发挥“五老”“乡贤”人员力量，化解群众诉求321件；矛盾纠纷处理上，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信访、邪教人员等不稳定因素的摸排，调处矛盾纠纷25条，化解信访7例；乡风文明上，扎实开展治理农村大操大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开展集中提醒谈话2次，个别谈话12次，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树文明新风和政策宣讲活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提升。

4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的运行优势、具体机制与主要问题

4.1 联村党组织运行的突出优势

4.1.1 片区联合党委统领

综观巴中市联村党组织实际运转可以发现,县域片区联合党委以一种总体性力量贯穿于各联村党组织运转的全过程中,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片区联合党委的组织力量始终“在场”,更表现在片区联合党委以统领、引领、整合、治理作用的发挥始终“控场”。换言之,片区联合党委“在超越自上而下科层逻辑与自下而上自组织逻辑的‘二元悖论’,以党组织统揽、统领、统筹的政治逻辑作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主线,全面强化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统领作用”^①,实现政党、国家、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第一,片区联合党委统领保障了联村发展的科学性。片区联合党委注重施展“统”的作用,根据区域功能配套性,打破条块分割界限,以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为总牵引,以片区整体规划融合为总抓手,科学地将村党组织纳入功能片区党委,由片区党委负责统筹协调、资源整个、规划指导。把联村党组织设置为片区联合党委的二级组织做法的实质是以党组织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适应农村基层党组织客观条件及其变化顺势调整、优化党组织的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式,既严密了党组织联合发展的组织体系,又避免了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谋求组织通过组织联姻增强组织建设过程中“闭门造车”出现联而无效的境况。第二,片区联合党委统领激活了联村发展的源动力。实现联村发展,激活各方内生动力是关键,联村发展的动力关切到多元主体与要素,单依靠个别村党组织力量极难唤醒各方力量、资源等要素参与联村发展。片区联合党委顺应片区发展趋势与联村发展需求,把广大群体和要素联结起来,通过自身统筹力量强化了主体与资源间的互动与聚合,真正起到了以外部力量正向激发内生动力的作用。作为联村发展的“轴心”组织,片区联合党委持续加强自身“统”的功能,放大“引”的效应,把分散的群体、资源集中在联村发展链条上,改变了部分村党组织以往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极大地促成了条块双向用力、上下协调联动联村发展的新格局。

4.1.2 多元主体尽锐出战

联村发展工作多、任务重、压力大,乡镇党委需要依赖自身组织优势进行组织再造来构建起一种党政社间“非常规复合型联系网络”,因此,选派贴合联村发展的联村党组织干部与成员成为实现联村发展红利最优抉择。第一,从联村党组织的引领者来看,甄选出的联村党组织干部基本是富有党建工作能力、有联村发展责任感、有乡村振兴使命感的农村基层干

^① 李辉. 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的新飞跃[J]. 探索,2021(5):92-102.

部。根据联村党组织案例观察和现实中联村党组织干部遴选情况看,联村党组织干部的选拔以乡镇党委直接委派为主,同时融合了基层干部自愿申请、片区代表联名推荐等多种机制。但是,“联村干部组的组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乡镇党政班子充分酝酿考虑之后的安排”,^①通常而言是在充分考虑联村发展实际需求以及农村基层党政科层人员调用便利性情况下“经过比较权衡综合考虑性别、工作年限、工作需要等因素以后被选定的”^②。第二,从联村党组织的参与者来看,加入的联村党组织成员普遍是联村片区内具备相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基础的组织或个体,形成了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基础、经济组织为关键等代表性主体力量尽锐出战的良好格局,最大限度上把好了联村党组织成员“入口关”,通过人员拉动撬动资源走动,为实现联村党组织运行效果奠定了人才前提。

4.1.3 资源整合平台优异

优异的资源整合平台是联村党建工作得以形成聚合效应的重要载体,在推进联村党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构建一个能够有机整合不同区域、资源的载体平台是实现联村成员交流对话、资源共享、协同工作的必然要求,缺乏载体平台就没有“链接条”,即使资源再多、路子再广、产能再大也难以实现多元主体和各类资源的协同效应。通过联村党组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资源丰富的中心村在联村党组织运行过程中发挥了连接联村成员的桥接作用。第一,以中心村为阵地搭建联村党建平台坚持了“党建姓党”的一贯主张,同时中心村党建资源丰富,为营造浓厚的联村联建氛围提供了党建资源。一方面参与联村党组织的主体呈现多元化、异质性强的特点,不同主体成员或党建质量参差不齐或暂未成立党组织,中心村党建资源丰富、党建历史悠久,以中心村为基础搭建联村党建平台符合“党建姓党”的组织定位;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党组织,中心村往往拥有更为丰富且高质的党建资源积累,在中心村搭建联村党组织平台不仅可以及时释放过剩党建资源、防止资源错配,而且能够多领域吸引和发动外部资源共同参与平台建设,使搭建起的联村党组织平台以其浓厚的氛围持续渗透影响联村党组织正向发挥作用。第二,中心村区位条件优秀,为多元联村主体提供了核心策源地,同时为构建联村发展共同体和提升党组织自我生产韧性提供了舞台。一方面,联村党组织部分必要工作开展需要适宜的地缘空间,其中区位条件是确定联村党组织平台方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中心村通常拥有相对便利的交通网络、丰富的社会资本、突出的经济资源,这些条件成为多元主体建立连通性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联村主体间并非原生性关系,其本质是党

^① 叶敏.联村干部:基层治理体系的人格化运作[J].中国行政管理,2022(4):105-111.

^② 王晓毅,杨蓉蓉.能动性:驻村帮扶的角色与空间[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03):111-122.

组织引领下形成的次生性关系，这表明联村主体间的有机关系不会凭空产生，需要党组织引领助推建成“联村发展共同体”，中心村是党组织自我塑造的典范，以中心村党组织推动建立“联村发展共同体”成为党组织提升组织韧性、发挥辐射作用的不二选择。

4.2 联村党组织运行的具体机制

通过对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过程的考察，可以将其运行机制划分为以组织准备机制、资源整合机制、联习共训机制、利益共享机制为基本结构的工作机制和以议事协调机制、监督保障机制为基本结构的保障机制，六个二级机制共同组成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

4.2.1 组织准备机制

组织准备机制是指为联村党组织正式运行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的一系列筹备工作的总称，是联村党组织运行的起点环节。联村党组织的组织准备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策划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具体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联村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联村促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联村确立阶段，以上三个阶段环环相扣、有序衔接，共同组成相对完整的组织准备过程。

4.2.2 资源整合机制

资源共享机制是指联村党组织对资源进行整合与共享的全过程，其核心是通过对持有的各类资源再识别、再区分，并选择性地予以汲取、重组、融合，以达到提高自身资源获取力与运用力的目的。联村党组织的资源整合是一个动态且繁杂的过程，是以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为导向，由联村主体拼凑、整合资源，最后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资源需求阶段、资源拼凑与整合阶段、资源使用阶段。

4.2.3 联习共训机制

联习共训机制是联村党组织从理性互惠走向互学互促的程序安排，是指联村党组织学习培训过程固有的运转方式，是联村党组织干部培训系统中各主体、客体、程序之间有机组合形成的有序运动。作为联村党组织干部学习培训的集合体，联习共训机制包括探询培训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开展培训课程等过程。

4.2.4 议事协调机制

议事协商机制是联村主体之间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下，就联村发展中重大、疑难、复杂问题，遵循一定程序进行对话、沟通、协调、让渡等交流互动方式，并形成最终决议方案，以实现问题妥善解决的机制。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机制主要靠联席会议制度运行，有其相对独特且完整的程序，基本按照“议题确定——议题协商——议题公示”三个步骤进行。

4.2.5 利益共享机制

利益共享机制是指联村党组织在各联村主体之间通过协商等方法按照一定比例共享联村党组织现有资源以及一切发展创造成果的利益分配安排。其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联村党组织利益共享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第二，联村党组织的利益共享是一个过程；第三，联村党组织利益共享的内容囊括了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从程序角度审视联村党组织利益共享的实现机制可以将其划分为利益表达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分配机制。

4.2.6 运行保障机制

运行保障机制，联村党组织运行保障机制是指保证联村党组织活动有序运行的内外部条件的总和，是贯穿于联村党组织运行全过程的重要机制，具有支持、调控、补救、监管等功能，包括联村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保障机制、组织经费保障机制、组织监督保障机制、组织考核保障机制等内容。

4.3 联村党组织运行的主要问题

4.3.1 组织准备机制的充分性不足

首先，联村党组织调研工作开展不足。调研工作是组建联村党组织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也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①但在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组建工作开展过程中“拉郎配”现象时有发生，导致部分联村党组织运行中出现“联而不和”、“联而无效”的尴尬局面。在实际工作中对联村党组织的目标、主体、内容等没有进行深入考察，表现在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成立联村党组织时过分追求“以强带弱”、“以老带新”，未把干群意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等众多因素充分考虑进去，一味地搞“赶鸭子上架”式联合，进而出现因缺乏详实、科学和可预见性的调研工作报告导致联村党组织实际运作可操作性不强、运行效果不佳的情况。

其次，联村党组织干部选拔来源不足。干部在联村党组织运行中发挥着中梁抵住的作用，因此联村党组织干部的选拔对实现联村发展目标意义重大。但在在巴中市的实践中，联村党组织干部的选拔存在来源不足的问题，难以打破多元主体交互壁垒实现耦合共生。联村党组织是基于多元主体地位平等条件下的协同参与治理所形成关系的总和，其干部来源理应涵盖多元主体，结合调研和掌握的二手资料来看，虽然多数农村基层政党组织已经开始重视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振兴乡村，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联村党组织干部选拔过程中并没有将企事业

^①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115.

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乡贤能人等纳入联村党组织干部队伍中，囿于传统政党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农村基层政党组织成功上升为一级管理者，使得多元主体因话语权匮乏而产生联动效果不佳的问题。

再次，联村党组织阵地建设投入不足。联村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和激活需要一定的组织阵地予以支持，阵地是组织、凝聚联村党组织成员的基本场域，更是联村党组织工作开展的基本平台。调研中联村党组织干部反应，阵地建设薄弱成为部分联村党组织工作开展的一大顽疾，严重影响了联村党组织的正常运行的可持续性，具有表现在有形阵地和无形阵地两方面。一方面是缺乏专供联村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及活动的有形阵地，如联村党组织会议室、联村党组织标识等。现实中，多数联村党组织组建周期不长，办公条件普遍较为简陋，缺乏相关设施设备，联村党建氛围不足，致使联村工作因阵地建设投入不足出现会议、工作开展不及时的现象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是缺乏专供联村党组织成员联系、交流的无形阵地，如“互联网+联村党建”阵地。以网络阵地为代表的无形阵地是联村党组织的重要阵地，对区域跨度较大的联村党组织成员有极高的适切性，但就实践调研来看，相关网络阵地建设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联村党建工作的覆盖面，降低了联村党建工作效率。

最后，联村党组织制度设计针对不足。制度是一项关涉事物运行程序的现实规约，它要求社会成员在制度规定的边界范围内按规章或准则有序活动。^①随着联村党组织的成立与发展，相关制度设计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因联村党组织制度设计针对性不足存在的制度空白较大、制度效力不够和制度监督困难三方面。一是制度空白方面，联村党组织相关制度来源主要依靠上级联合党委外生供给，而上级联合党委通常一般更多考虑片区联合党委的适用性，联村党组织内部如何运行只能“摸石头式”自我探索，制度空白缺口较大导致联村党组织内部运行困难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制度效力上，联村党组织涉及多套班子与多元主体，一些联村党组织在制度设计时未仔细思索各联村成员的执行能力，从而导致联村成员因时间过紧、资源条件有限等主客观因素无法落实相关制度。三是制度监督方面，当下联村党组织运行监督还存在较大盲区，主要表现在联村党组织监督体系仍不够完善，具体在现实中联村党组织制度设计缺乏对监督方面的顶层规划，存在只重视联村党组织书记这个关键少数而忽视联村党组织及其成员运行具体过程的问题，全过程运行简单较为困难。

^① 马明冲.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论析[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8(1):12-20.

4.3.2 资源整合机制的整合度不强

首先，资源需求表达不足。对资源需求的表达是促进联村党组织资源整合的核心因素，然而，当下在巴中市部分联村党组织中还存在联村主体成员间资源需求表达失语、失真的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原子化的个体资源需求表达意识不强、组织化的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表达扭曲和行政化的农村党组织需求表达服务能力低下等三方面。一是原子化的联村党组织个体资源需求表达意识不强。加入联村党组织的成员原先是各自组织的主体，与其他组织联系基本是疏远、隔离的状态，“原子化”特征显著，加之不同成员间原属组织异质化明显，囿于不同成员间原有办公办事思维、习惯的差异，导致在表达资源诉求时联村成员一味地期待联村党组织统筹包揽“下放”资源而持观望、试探的态度，迟迟不愿合理表明自身资源需求，影响了资源整合的有效性。二是组织化的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表达扭曲。从本质上来说，联村党组织是依靠资源堆砌、重组、打造起来的党组织，在组织塑造过程中要求联村党组织不断汲取各个组织的资源，但是并于等同于所有资源能够为联村党组织所用，应当依据联村党组织发展、运行目标有针对性地向各组织表达资源需求，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小部分联村党组织并未客观、专业地对联村资源需求进行考察，想当然地汇报相关资源诉求，脱离甚至歪曲了联村党组织发展资源需求。三是行政化的农村党组织需求表达服务能力低下。现实中联村党组织的资源需求偏好主要由片区联合党委（即曾口镇片区联合党委）搜集和整理，且通常情况下片区联合党委由乡镇党委书记担任，各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偏好汇集需要片区联合党委大量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受农村基层党组织行政化、半行政化运行的惯性使然，片区联合党委基于时间或者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较为草率的收集相关信息，加之汇报过程中层层传达，极有可能导致资源需求失真的情况出现。

其次，资源整合链接困难。资源共享是联村党组织成立的核心愿景之一，然而，当前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资源链接存在碎片化、局部化的样态怪相，主要表现在资源链接信息不对称、资源链接方式单一以及其他正式组织对资源链接的排斥行为三方面。一是资源链接信息不对称。联村党组织的多元主体原本依托于某些特定资源而存在，其中大部分主体自身资源较为单一，资源失衡现象偶有发生，因此，各参与主体均或多或少希望在联村党组织的有效运作中达到资源互创的效果。但根据目前部分联村党组织的资源链接实践成效来看，联村党组织参与主体还不能够根据成员需求或组织发展需求提供及时、对称的资源链接信息，无法形成信息闭环，导致了在资源链接过程中不能使资源互创的前段、终端和末端环节实现动态耦合。二是资源链接方式单一。单就实地调研的曾口镇三产融合联村党组织在资源链接中的表现来看，部分联村党组织仅将相关资源进行简单的清算和融合，少有资源能够通过联建项目链接

到组织上，资源链接方式以数据链接、项目链接等简单应急方式为主，资源链接程度整体较低。三是他正式组织对资源链接的排斥行为。现实中，一方面，各联村党组织资源长期分布于原生组织之中，资源碎片化、割裂化现象凸出；另一方面，联村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导致组织公信力普遍较弱，上述内外因素使得小部分正式组织对资源链接产生了排他性心理，联村党组织资源共享发展面临“合作疲软”的障碍。

最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资源利用环节是资源价值创造环节，更是联村党组织整合资源成果佐证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联村党组织资源利用中存在着相当数量资源闲置或未被充分利用的现象，联村党组织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比较突出，集中表现在联村资源使用意识不强和资源资源配置不合理两方面。一是联村党组织资源使用意识不强。当下联村党组织资源整合的类别与增量渐次攀升，但联村党组织资源使用意识与能力却不尽如意，部分联村党组织甚至出现了“整合有余，利用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虽然联村党组织汇集了政党、政府、基层、社会等各层次的丰富资源，但在组织或项目运行中仍旧优先考虑原有资源，调用整合起来的组织资源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长期以来，基层组织资源循环以组织内循环为主，打破基层组织资源配置差异化格局，促使资源流动实现内外循环及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成为联村党建的主要目标。观察联村党组织案例情况可知，部分联村党组织资源配置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具体表现在仍有小部分联村党组织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沿袭了科层制治理逻辑，诸多资源要素分配过多依赖于联村党委或联村干部的注意力，上级组织资源配置注意力的不同导致资源流向的不同，极易导致资源下沉不均衡现象出现，影响着资源使用效率。

4.3.3 议事协调机制的联动性不够

首先，协商形态单一长期存在。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的基本诉求是：在联村发展中强调多元合作并形成共识性决策。因此，适时地选择民主旨趣与议事功效并存的协商形态是发挥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机制作用的必然选择，然而从议事协商的实践过程来看，多元主体在议事协商中存在着因议事协商模式单一导致联动式协商质量低下的问题。具体来说协商形态单一集中表现在三点：一是协商形式固化。协商典型与协商创新是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经验之一^①，经过基层的长期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开发出恳谈会、评议会、座谈会、听证会等各具特色的协商形式，当前联村党组织普遍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议事协商，虽然联席会议

^① 赵秀玲. 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发展[J]. 甘肃社会科学,2022(3):9-17.

“集中式合作”与“非制度化”的特点与多元主体协商匹配度极高^①，但是一味地移植其它地区的成功经验，不根据联村党组织工作实际选择议事协商方式，难以高效推动联村工作开展。二是协商氛围单调。生动活泼、开放包容、畅所欲言、理性探讨的良好议事协商文化氛围是提高民意兑现实效性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履行过程中，仍有部分主体感知到议事协商氛围比较寡淡，主要表现在内容陈旧和程序随意两方面。一方面，联村党组织根植于农村社会基层，联村党组织发展事项必然涉及农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议事协商内容自然带有一定的庞杂性，但当下议事协商的主题仅限于联村经济发展、联村组织发展等议题，低水平地重复性议题使多元主体疲于商讨，拉低了民意整合质量；另一方面，一些联村党组织在议事协商过程中存在“仪式化”协商、临时化协商和以通报代协商等毛病，如在议事协商过程中仅商议一些无关痛痒的事项，反而在诸如联村党组织干部的选拔、联村党组织重大发展项目等重大事项上内部决定，长此以往，议事协商机制形同虚设，民主决策失灵，集体决策效果不理想。三是协商技术简单。民主协商的共识实现离不开技术支持，以大数据为时代背景将协商技术定位在数字技术的运用上可以发现大部分联村党组织的议事协商技术是存在缺陷的，通过访谈了解到部分联村党组织在协商上普遍沿用农村基层协商的制度与程序，极少运行技术外力赋能民主协商，协商技术创新与民主旨趣之间的刚性张力凸显，致使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落入简单化、机械化的窠臼。

其次，协商助力不足表现突出。议事协商机制作作为联村党组织民主建设的重要范式，其正常运行必然离不开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多元主体参与能动性与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的质量直接相关，从运行实际来看，一些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中多元主体参与度和贡献度达到了联动式协商的理想状态，然而，事实上仍有不少联村党组织在议事协商中存在多元主体联动协商参与合力不足现象，集中体现在主体议事协商意识浅薄和联村党组织干部背离民意意愿两方面。一是部分主体议事协商意识浅薄。协商意识是主体本身在议事协商过程中主观能动地表达联村党组织协商议题客观认识的意愿，它侧面的反映了主体作为联村党组织成员身份平等的确认程度。联村党组织的多元主体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然而在议事协商实践中不乏有主体或主动或被动地降低了自身在联村党组织发展共同体中的地位认同和心理归属，导致有的主体在议事协商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高，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担心地位、眼界水平有限不敢提出议题；认为自身话影响力有限或与自身利益不相干不愿就议题展开充分讨论等方

^① 赵子龙,吴维旭,黄斯嫒.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基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案例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3,16(01):70-87+198.

面。如在曾口镇三产融合片区联村党委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中发现尽管多元主体就自身在联村党组织负责项目类别开展进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其他主体并未围绕该主体论述议题展开充分讨论,由此拉低了议事协商机制的功效。二是部分联村党组织干部背离协商民主意愿。联村党组织属于斜向型协作模式,此类型协作方式超脱于行政、行业等限制,是多元主体平等互助关系网络的聚合,然而多元主体地位平等并不等同于虚化协作领导层的作用,联村党组织干部在议事协商过程中充当着管家的作用。但根据当前部分联村党组织在议事协商中的表现来看,与其说多元主体是在联村干部的指导下协商,毋宁说是在权力关系的指示下协商,这当中既存在联村干部干预不足,又有干预过度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在议事协商的过程中,一方面,联村干部未根据议题恰当地引导多元主体展开充分讨论,任由多元主体协商状态畸形发展的局面持续,低沟通、低互动的协商状态直接弱化了联村党组织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联村干部侵蚀了多元主体协商空间,自作主张式的决定议事协商议题,联村干部的控制程度成为协商议事的边界,最终越俎代庖般的议事协商形式逐渐消弭了集体协商的意义。

4.3.4 联习共训机制的持续性不高

首先,联习共训周期缺乏整体性。在跨组织背景下工作的联村干部需要特定的知识、技能发展培训活动,以获得应对跨组织、多领域和相对棘手的联村任务的本领。对于需要不断更新处理联村工作方式的联村干部来说,学习培训是贯穿于其角色发展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因此如果要确保学习培训有效,那么它一定是基于联村党组织整体运转的系统性活动。但是以在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机制的表现来看,短期培训思维占据了培训政策制定者的思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快速培训和交付培训结果,这往往与联习共训机制的初衷相冲突。实地调研发现目前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活动以短期临时为主,培训层次和周期较短,曾口镇三产融合片区联合党委培训项目局限于每月一次的联席会议,并且每次开会时长基本维持在半天左右,其中工作性汇报还占相当比例,留给培训的时长并不充分,同时培训方式还以知识性、经验性灌注为主,对如何充分整合资源等实用技能培训现有涉猎,在联村党组织共性问题逐渐显露的今天,单次短期培训明显不足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其次,联习共训资源缺乏维持性。联习共训机制的运转有赖于源源不断的优质学习资源,由此可见维持相关型学习培训资源的能力是其机制实现整体性的关键。资源依赖理论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自给自足^①,同样联村党组织也需要不断地在组织内外搜集学习资源,

^① 张茂元,黄玮.资源依赖中的社会组织同构分析——以社会组织党建实践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以实现学习资源增益螺旋式增长的目的。然而目前在巴中市联村党组织维持学习资源的方式和能力都比较有限,致使有限的学习资源与实际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张力。一方面,获取学习资源的途径狭窄。一般而言联村党组织学习资源的获取主要有三种,一是互联网学习资源搜集、二是上级片区联合党委学习资源供给、三是片区内部联村党组织学习资源分享,其资源大都是外源正面经验输入,缺乏负面问题的实操解决之道,因而当联村党组织运转出现瓶颈时,那些看似正确的生存之道并不能为其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获取学习资源的能力薄弱。除了外源性学习资源输入外,联村干部还需要具备生产学习资源的能力,显然当下部分联村干部资源补位能力不够到位,集中表现在联村干部贪图便利单纯地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源,容易出现学习资源同质化现象突出、缺乏与本地联村党组织精准对口的学习资源的问题。

最后,联习共训实践缺乏稳定性。联村党组织耗费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时间在学习培训活动中就为了让联村干部将学习培训成果迁移到具体工作任务中以达到组织受益的目的。但有联村干部反应对学习培训自我效能感较低,在学习培训活动中习得的知识与技能只有以小部分真正用在联村工作中,总体学习培训成果转化率不够稳定,主要表现在实操环境和实操评价缺失两方面。一是实操环境缺失。训后实操是联村干部学习培训成果转化的最佳阶段,遗憾的是部分学习培训活动与实操项目衔接不当,脱离具体操作环境的联村干部难以将其在学习培训活动中获得的启示与构想实践出来。二是实操评价缺失。培训成果转化的自我效能感与组织认同感是明显正相关的,及时对联村干部培训成果转化实践过程进行评价有助于触发联村干部对操作项目的修正和调节,但目前对联村干部的实操情况进行评价基本在项目完成后,过程性评价缺位可能会极大消耗联村干部培训成果转化的热情。

4.3.5 利益共享机制的协调性不佳

首先,利益表达路径阻塞。在联村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利益竞争和利益冲突,不合理的利益竞争势必会导致利益损失甚至于合作关系破裂,而利益表达就具有表达利益诉求、化解利益矛盾、实现利益平衡的功能^①,为促进多元联村主体参与利益表达,联村党组织从纵横两方面搭建了利益表达途径,但是目前来看,巴中市联村党组织利益表达路径存在纵向路径回应性不均和横向路径开发度有限的困境。一是纵向利益表达路径回应性不均。所谓利益表达的纵向路径是指联村党组织集体认同的在正式制度范围内表达利益诉求的垂直传播方式。目前联村党组织基本建立了以联席会议制度为核心,包括协商议事制度和信

学学报,2022,51(03):84-93.

^① 李尚旗. 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探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15(9):161-165.

访制度在内的利益表达制度框架,但是根据掌握的资料看,不同主体对利益表达制度的回应性差别较大,并由此出现了机会主义倾向盛行导致的分配不均障碍。具体表现在不同利益主体持有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不尽相同,诸如企业等资源持有量较高的主体有较高的信息资源捕捉能力,因而对利益表达制度有较高的响应度,并且愿意在利益分割时讨价还价;而农民合作社等群体则囿于信息、眼界、能力等限制,在利益表达中处于劣势地位,不懂得利用相关制度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利益分配公平。二是横向利益表达路径开发度有限。所谓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是指利益主体表达信息的“水平传播渠道”^①,当下联村党组织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主要是线上的关系网络交流,这种利益表达方式与工作时间紧张、工作任务繁重的联村党组织有较高的匹配度,但是目前联村党组织暂未过多的开发线上关系网络利益表达渠道,利益信息扩散圈被技术、权力、资本等截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元主体利益表达意识苏醒、行为落实的实现。

其次,利益分配格局失衡。所谓利益分配格局是指把组织既得利益分派到利益主体中表现出的形态模式,即在联村党组织利益收益范围内确定的多元联村主体利益获得的分配方式与份额的形式。随着联村党组织的逐步发展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但以当前多元主体的满意度来看,利益分配方案呈现出粗糙不均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不同主体获益失衡和利益分配内容范围失衡两方面。一是不同主体获益失衡。前文提到目前联村党组织利益分配的方式主要有投入资源按比例保底分红或收益分红分配法、利润返还分配法等。联村党组织是资源集中型组织,在实际利益共享工作中以投入资源比例保底分红为主,以这种方式为主导分配机制存在巨大隐患。呈现在具体工作中不乏缘于对利益公平共享观念的扭曲认识,那些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强势主体为更多地攫取收益在资源股份估价过程中粗略估计、故意偏袒的行为层出不穷,获益对比的强烈差距超出了其他弱势主体接受程度,逐渐弱化了多元主体情感联结的作用。二是利益分配内容范围失衡。联村党组织主体最基本的利益无外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在利益分配内容上并未实现二者的统一,集中表现在确定利益分配边界时注意力过多的聚焦在经济利益上,鲜少涉及到经济利益之外的内容。多元主体基本利益的内容是嵌入在联村党组织运行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有权知晓并参与联村党组织的建设与改革,但诸如利益表达、议事协商、民主监督等政治利益诉求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多元主体的基本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合作的积极性。

^① 邱新有,邹菲琼,王丽华. 论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6):79-87.

最后,利益补偿机制匮乏。联村党组织利益共享机制运行过程中分配不均情况的出现在所难免,及时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缓解受损主体的利益剥夺感与不公正感,有助于利益受损方和利益获益方的协同共生,由此多元主体间恰当的损益关系得以形成,联村党组织协同治理的健康秩序也得以维持。然而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发现联村党组织利益补偿机制暂未完全建立,以致出现补偿主体模糊、补偿方向错乱、补偿行为割据等错误倾向。一是补偿主体模糊。作为组织性多元主体的联村党组织,其优先受偿主体一定是组织主体,其次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体,而囿于多元主体自私自利的局限性,如何客观公正审视利益受损主体在联村发展中做出的牺牲,并根据利益受损程度评判是否将其纳入受偿主体成为利益补偿机制运行中的困惑。二是补偿方向错乱。传统科层体系以转移支付等方式的纵向扶持程序繁杂、冗长,而联村党组织主体成员间不具有隶属关系,以多元主体间互惠互助的横向情感联系共同应对利益分配不均是比较佳的补偿方向,然而截止目前来看,相当一部分联村党组织只是在原地等待上级党委“空降”补偿政策,忽视了诸如产业转移、飞地经济等横向补偿方向,使得补偿行动迟迟得不到落实。三是补偿行为割据。联村党组织补偿行为割据主要表现在对受偿主体实施补偿过程中脱节、不连贯。通常在拟定补偿计划中遴选受偿主体、衡量受偿标准、选择受偿形式等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但一些联村党组织在某些工作环节中不够缜密、一拖再拖,导致补偿行动不能一气呵成的完成,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利益受损主体的情感。

4.3.6 运行保障机制的完备性不全

首先,组织经费保障力度微弱。充足的物质保障是联村党组织推进阵地打造、活动开展、项目运营的重要支撑,然而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组织经费保障力量微弱已然成为绝大多数联村党组织的通病。联村党组织的这种通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费来源单一,另一方面是经费管理粗放。一是经费来源单一。根据掌握的资料来看,联村党组织经费来源渠道包括上级联村党委拨款和联村党组织运营收入两种,其中政党财政投入占绝对比重。加之近年来,由于一些联村党委不加节制地扩充联村党组织数量,各联村党组织刚性支出不断增大使得释放到单个联村党组织的资金有限,单纯依靠联村党委财政拨款极难保障联村党组织经费充足,多元经费筹集机制尚未形成制约了联村党组织的健康运行。例如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问及联村干部经费保障时,就有联村干部反应相关配套资金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许多联村干部工作全靠“情怀”。二是经费管理粗放。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收支是联村党组织经费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为避免与村级党组织账目混乱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从经费管理整体来看,联村党组织财务管理缺乏战略性和精细化的问题,一方面经费使用项目仅

限于阵地打造、人员培训等常规性支出，没有预留抵御外部风险、联村干部配套激励等额外经费，导致联村党组织对抗风险能力较弱、联村干部工作情绪不高；另一方面是将财务管理等同于财务记录，其意义并未上升到联村党组织经费的管理上，脱离了财务核算向财务经营的管理方向。

其次，组织监督保障范围狭窄。联村党组织兼具组织振兴、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等多重任务，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既是确保联村党组织工作任务保质保量完成的必要手段，又是及时预防和纠偏联村党组织及其干部行为失范的关键。然而就具体运行实际来看，虽然绝大部分联村党组织都制定了一些监督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督查督导的效果，但无论从监督的主体还是监督的客体都稍显不足，监督力量绵软。一是监督主体构成狭窄。所谓监督主体是指能够对联村党组织实施监督作用的一切力量，涵盖片区联村党委、联村党组织干部及成员、联村范围内涉及的群众等。可是根据掌握的资料来看，联村党组织监督主体有限，出现了既未管住“关键少数”又未盯住“绝大多数”的窘境。具体表现在监督主体上仅限于上级片区联村党委，缺少联村干部的同级监督和联村区域内群众的下级监督，难以形成监督合力。如在调研中得知，一般情况下片区联合党委只是根据定期汇报和年终汇报对联村党组织进行监督，或因地理空间距离较远或因工作繁忙导致极难对联村党组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细致化监督。二是监督客体范围内容狭窄。所谓监督客体是对监督活动所指对象的一系列概括，联村党组织监督范围的核心是联村党组织整体运行状况，包括联村党组织的干部履职情况、成员思想情况、项目运营与活动开展情况等。然而在实际监督过程中，小部分联村党组织存在只抓重大生产项目的落实情况的问题，认为只要生产项目收成好就代表联村党组织干部履职能力强，对联村干部及其成员的履职能力及其思想状况等不闻不问，为监督范围留下一定空白。

最后，组织考核保障标准模糊。作为检验联村党组织运行成绩的关键环节，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是鞭策联村干部履职尽责、激发联村干部工作潜能、协助联村干部自我纠察的重要方法。然而在联村党组织的组织考核工作中发现，目前针对联村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相关考核工作不够规范、系统。一般而言，考核指标的内涵与外延都应该有明晰的界定，其内容应具有客观性、可比性、综合性^①，但凭据掌握的联村党组织相关制度文件来看，相关文件鲜少对联村党组织干部履职尽责的要求与评价做出具体描述，这意味着在实际考核工作中很有可能出现因考核标准模糊不清而造成的考证结果主管随意性较大的错误倾向。比如在

^① 谢治菊,范嘉雯. 驻村干部考核:要素、功能与优化[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1):100-110.

调研过程中问及联村干部是否有相关针对性的考核标准时,联村干部反应到在考核评价工作中以片区联合党委的定性评价为主,极度依赖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抽象、模糊的评价方式于联村干部而言区分度不够、说服力较弱、操作性较强,难以量化联村干部的工作情况,导致联村干部考核评价的意义大打折扣。

5 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优化路径

5.1 加强组织准备机制的充分性

首先,扎实做好联村党组织调研工作。解决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联而不和”“联而无效”的问题,做实调查研究工作是关键。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①,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仅能够推动形成对联村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且能够为联村党组织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可靠保证。在组建联村党组织的过程中,一方面,无论是片区联合党委还是多元参与主体都必须树立问题意识,主动根据联村区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调用组织内外资源去认识、了解,甚至是观察和接触联村党组织这种创新形态,通过掌握丰富的一、二手资料对联村党组织形成全面系统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归纳、演绎、对比等方法对搜集到的运行材料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式加工处理后,根据联村区域特色结合设计相关运行机制,并在实践中对设计好的运行机制反复地予以追踪、对比和验证,通过多次实战经验的循环往复形成对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理性认识,使其正式构成其运行机制的具体内容。

其次,多元渠道选拔联村党组织干部。打破巴中市联村党组织因干部来源渠道单一可能出现的多元主体交互壁垒、话语权匮乏等问题,坚持多渠道、宽范围选择联村干部是根本路径。联村干部在联村党组织运行中发挥的是改变部分村级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状况、建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量,只有科学选拔联村干部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用。第一,斜向扩宽联村干部的来源渠道。斜向层面扩宽联村干部来源渠道是在总体乡村振兴人才资源较为有限情况下开发联村人才的重要方法,更是解决部分联村党组织“两套班子,一班人马”的有力举措。因此在联村党组织干部的选拔渠道上,要坚持上派下选的原则,既舍得从片区联合党委、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派遣德才兼备、富有开拓精神、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优秀党员,又重视从企业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等院校等基层一线组织中精心甄选优秀党员作为联村干部人选。第二,疏通联村干部跨组织调配的道路。疏通联村人才跨组织调配的道路是祛除联村人才的各种顾忌的一大法宝。这就要求联村党组织在制定干部选拔政策阶段,尽量减

^① 冯连军.习近平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J].理论视野,2021(04):34-40.

少一些不必要的实质性壁垒和条条框框,尤其是在联村干部任用的过渡形式上,要尽可能的少设程序和台阶。第三,大胆信任和任用联村人才。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选拔联村发展人才后的重点是信任和重用他们。总体来说就是要对联村发展储备干部有信心、敢任用,联村党组织时间紧、任务重的特征决定了其必定是必然是乡村振兴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长期扎根农村基层,或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或具体熟练的技能操作、亦或是丰富的资源带动能力等,对这些有联村发展本领的人才可以减少顾虑、大胆任用。

再次,稳步投入联村党组织阵地建设。联村党组织工作阵地是联村成员交流互动的桥梁,加强其阵地建设有助于营造浓厚的联村党建氛围、提升联村党建工作效率。尽管联村党组织是“非常规”“临时性”的党组织,但是不能因此不搭建组织阵地,应该在联村党组织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资源获取和工作开展的便利性逐步投入阵地建设。一方面,稳步投入实体阵地建设。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样态,联村党组织这种实践模式的存续时间并不确定,不假思索地建设阵地、购买设施设备极易造成资源浪费,在阵地建设方面可以按照阵地、设施、标识的层级渐次投入。在活动场所上,部分联村党组织尝试在行政村党组织或者是联建成员党组织开辟组织阵地就是很好的尝试;在设施设备上可以根据联村党组织协同办公的频率或借用或配置相关器材;在联村标识上,逐步支持如联村党组织办公室、联村干部成员表等标识配置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快投入网络阵地建设。这要求在联村党组织高度重视网络阵地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搭建联村干部易于操作的工作平台,如微信、QQ、腾讯会议等;二是开展网络技术培训提高联村干部用网懂网能力;三是协调配置网络工作设备防止网络阵地失联。

最后,对症设计联村党组织运行制度。运行制度是落实联村党组织工作的主渠道,化解因制度设计针对性不足导致的一系列困境需要以提升针对性为切口,探索强化联村党组织制度运行效果的现实路径。对症设计联村党组织运行机制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坚持片区党委在联村党组织运行制度设计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制度化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法规等制度性元素管党治党的第二种利器^①,百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正反经验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政治保证。片区联合党委作为联村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一方面要始终遵循党的组织建设方针,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发表的相关重要讲话为指引,在联村党组织制度设计中全面展现党的方针政策和思维逻辑;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对联村党组织制度设计的全面领导,以片区联合党委书记为第一负责人,

^① 贺东航.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脉络和重要制度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05):49-58.

以制度的提案、拟定、修订、运行全程在位保证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先进性。二是引导多元主体围绕联村党组织运行制度设计供给智慧经验。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对联村党组织运行制度设计的智慧经验，要正视多元主体在制度设计中的地位作用，尊重不同类型组织在组织建设中的差异性经验，积极调动多元主体在运行制度设计中出谋划策、建言献策的主动性，引领他们把组织建设、组织合作中形成的智慧、经验进行归纳和提炼，并根据联村党组织的运行特点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运行制度。三是设置联村党组织制度运行评估方案与追踪机制。联村党组织制度运行必须保持动态反思的观念，在运行制度正式确定前应对制度实施的预期效果、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的应对措施做出研判；在运行制度正式实施一段时间后，要建立追踪反馈机制，通过联村党组织制度执行情况和有关联村发展项目剖析制度质量、实施效果，及时优化联村党组织运行制度。

5.2 加强资源整合机制的针对性

首先，激活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表达。激活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表达机制是解决资源需求表达失语、失真、失效的动力源泉，要在充分考量多元主体资源禀赋、组织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激活、完善联村党组织资源需求表达机制。一是刺激多元主体积极表达资源需求。刺激多元主体需求表达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多元主体的联村意识，可以积极通过宣传教育促进多元主体强化联村发展事业的主人翁意识，使其认识到自身是联村事业发展的主体，拥有表达、阐明自身资源需求的权力与义务。二是引导联村党组织合理表达资源需求。引导联村党组织合理表达资源需求的重点在于将多元主体的特殊性需求转变为联村党组织的共识性需求，并且这种共识性需求一定是契合联村党组织发展目标的，片区联合党委要在明确“资源整合为了谁、资源整合依靠谁”的基础上，同联村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深入到联村党组织工作实际中，帮助联村党组织客观分析、理性表达资源需求。三是优化需求表达服务。优化需求表达服务是联村党组织实现资源供给精准高效的保障，这就要求片区联合党委转变需求表达服务供给思路，从等待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以联村党组织的类型和特点设计服务方向，尝试构建以“自上而下”需求表达为主，邮箱、联村党组织线上互动群等渠道为辅的需求表达机制。

其次，提高联村党组织资源链接效率。提高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资源链接的实现路径在于同步资源链接信息、升级资源链接方式以及培育联村党组织合作力量。一是同步资源链接信息。为了克服资源整合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联村工作停滞局面，必须注意及时同步资源链接信息，将可供于联村党组织发展的真实资源要素、数量有效传递给多元主体及联村党组织，一方面从资源整合信息的生产上来看，多元主体是资源整合信息的首要供给者，

联村党组织应加强同多元主体的沟通联系，主动为其宣讲资源整合的价值、培训资源清理的能力；另一方面从资源整合信息的供给来看，联村党组织作为信息资源整合的直接链接者，需要在对资源信息进行标准化改造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资源整合信息的公开、传播渠道来减少多元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合作信任感。二是升级资源链接方式。技术链接是医治联村党组织资源链接方式简单低效的可行尝试，应探索联村党组织数字协作平台建设，尽可能满足多元主体数字协同的需要，推动构建多元主体资源链接的有效互动。三是培育联村党组织合作力量。建立多元主体的情感链接是促进协作效用、减少其他组织排他性的有效策略。一方面可以适当借助联村发展项目、兴趣志向等要素开展联村集体活动来深度挖掘多元主体间的情感联系，促使组织成员情感再生，以联村成员间的情感流动扩散带动资源链接；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借助互联网媒体、报刊等媒介，大力宣传联村党组织运行的正向效果以获得其他组织及社会的认可。

最后，强化联村党组织资源利用培训。加强对联村党组织多元主体的资源利用培训是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资源利用观、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的基础手段。一是通过资源利用培训帮助多元主体树立正确的资源利用观。联村资源是联村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珍贵财富，必须通过资源利用培训使多元主体意识到联村资源就是拿来用的，这就要求片区联合党委、联村党组织干部等培训主体承担起培训责任，从参训者的立场和角度思考其资源使用的顾忌，积极宣传联村资源利用的必要性，鼓励他们在大胆在联村项目中使用相关资源。二是通过资源利用培训帮助多元主体提高资源配置能力。联村资源种类繁多，片区联合党委不可能无限期且事无巨细的帮助联村党组织进行资源搭配，因而要对联村党组织资源配置能力予以培训，联村党组织资源配置能力培训要立足于各联村党组织资源整合的情况，根据资源禀赋顺势而为，或采取方式打板或采取半操半学的方式，提升联村党组织资源统筹规划、科学选择、合理搭配等资源配置能力。

5.3 加强议事协调机制的联动性

首先，丰富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形态。丰富巴中市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形态的具体路径包括探索新型议事协商模式、营造生动活泼的议事协商氛围和重视网络议事协商技术运用。一是探索新型议事协商模式。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机制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联村党组织要在传统联席会议的基础上，以变革形式化、低效化的单一协商范式为目标，注重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的能动性创造，尊重多元主体首创精神，鼓励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途径探索建立对口协商、专题协商、小微协商等协商模式，同时重视将新鲜有效的协商经验进行提炼归纳，树立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的典型经验。二是营造生动活泼的议事协商氛围。

氛围的预先干涉性和同步传导性能够把多元主体引向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实践活动,也能通过回应多元主体议事协商需求使协商的广度、深度达到进一步扩散的效果。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氛围的打造要以丰富议事协商范围和实现议事协商流程重造为抓手,一方面必须坚持挖掘与联村党组织发展相关的议题,比如怎样实现联村党组织共同应对棘手治理问题的良好局面等现实问题,避免陷入因产业联兴难以突破而反复讨论牢笼,合理转移视线反而可能发现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必须重造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流程,联村党组织是不同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的实践产物,相关议事协商流程应当符合组织特性,根据当前议事协商效果适当简化、甚至切除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化程序,把议事协商的重心放在公开、透明的“议”和“商”上,如此才能形成多元主体畅所欲言、理性沟通的良好氛围。三是重视网络议事协商技术运用。一方面要增强联村党组织对网络议事协商形态的认同,要充分利用网络议事协商效果展示使联村党组织意识到网络议事协商技术是畅通议事协商渠道、缩短多元主体时空距离、消弭多元主体信息共享鸿沟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要缓解联村党组织技术使用排斥,在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协商民主在理念、技术和实践层面成为了可能^①,并且事实上我国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会议软件供国民使用,因此联村党组织需要主动顺应时代需要和工作需要,通过制定、观看操作视频讲解等方式主动提高自身网络议事协商技术能力水平。

其次,补足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动力。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活动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因此从议事协商参与主体的角度来看,补足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动力的具体路径包括培育多元主体协商的意识以补充精神指引力和强化联村干部协商责任意识以补充组织牵引力两方面。一是培育多元主体议事协商的意识以补充精神指引力。协商意识是协商行为的潜在基础^②,联村党组织可以尝试通过民主协商理论宣讲和民主协商文化熏陶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多元主体协商意识,这就要求联村党组织充分发挥联学共训机制的作用,在学习内容上适当地侧重于民主协商理论方面的内容,在学习形式上借助一些间接、内隐式的活动促使多元主体对议事协商参与角色形成一定的认知力,帮助其实现从“他者”协商向“自者”协商观念的转变。二是强化联村干部协商责任意识以补充组织牵引力。责任意识指将自觉履行职责作为价值信条与行为方式的思想观念^③,联村干部协商责任意识的强化要以主体

^① 徐风月. 新时代网络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实践梗阻及优化路径[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3):49-60.

^② 王洪树.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4.

^③ 陈晓晨.责任意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结合的纽带[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03):24-25.

责任意识、主体服务意识和主体效能意识为切入点。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主体责任意识,要充分借助理论、制度学习让联村干部明白自身肩负着议事协商效果的担当责任与问责责任;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主体服务意识,不断提升联村干部履责的同向性与协调力^①,这就要求联村干部发挥好议事协商“管家”的作用,细化联村干部的职责安排,明晰联村干部的职责边界,建立联村干部的问责激励;再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联村干部的主体效能意识,这就要求联村干部在议事协商工作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多元主体协商的原则不动摇,要以实现全体联村党组织成员的协商共识为目的,做到不为向上邀功而过度干预联村党组织议事协商活动。

5.4 加强联习共训机制的持续性

首先,增强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活动设计的整体性。增强联村党组织对联习共训活动设计的整体性是应对短期培训思维长期占据学习培训活动制定者头脑的有力手段。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活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从整体上全面规划设计,既要注重内容设计的系统性,又要注重周期设计的系统性,还要注重方法设计的系统性。一是联习共训活动内容设计的系统性。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的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联习共训的活动内容决定了其运行的形式,因此必须科学、系统地设计其活动内容。在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活动内容的设计上要以全国各地联村党组织在联习共训生活方面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教训为参照点,结合联村党组织情况,把联村党组织的知识教育,指导理论,相关的制度、文件、指示,运行的业务知识能力以及组织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的内容全部囊括进去。二是联习共训活动周期设计的系统性。作为创新性组织形态,联村党组织必定有许多理论知识与业务技术需要多元联村主体去学习和培训,单次学习培训显然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重复学习培训便成为了完成上述目标的最优解。在联习共训活动设计的周期上,要以符合联村干部业务能力生成和发展的顺序为逻辑前提,根据理论知识、业务能力学习培训的完整性渐次展开。三是联习共训活动方法设计的系统性。设计灵活多样的学习培训形式是发挥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机制效能的重要措施。要在全面掌握联村党组织成员时空便利性、培训形式可接受度的基础上,适当将理论深度讲授培训法、集体讨论培训法、典型案例培训法、实践操作培训法等多元培训方式纳入联习共训活动的培训方法体系之中。

其次,增强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学习资源获取的可持续性。应对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机制运作中出现的联习共训资源间断性难题,必须拓宽其资源获取的渠道和提升其资源获取的

^① 赵桂英,田雪梅.论新时代领导干部责任担当意识的强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08):35-37.

能力，以丰富、优质的联习共训资源推进多元主体互学互促。一是要拓宽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资源获取的渠道。以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活动开展实效来看，单一垂直外源性的正向资源很难满足联习共训机制的需要，相较而言其他成立时间较长联村党组织具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和资源，是联习共训资源供给的重要补充来源。因此，要主动与全国范围内的联村党组织“模范”和片区联合党委内的联村党组织横向建立线上、线下联系，不断挖掘联村党组织实际运行的痛点、难点以及解决之道，以其实际运行的正反经验为联习共训活动资源补位。二是要提升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资源的获取能力。联习共训资源的获取能力直接决定了联习共训运行机制的存续问题，确保其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持续提升联村干部获取相关资源能力，既要注重向外挖掘更要注重向内生产，向外挖掘上要求联村干部根据在组织发展目标和成员工作需要培养自身资源搜寻能力、资源引进能力，向内生产上要求联村干部充分开发联村区域内部资源，生产特色化对口资源以提高资源更新能力、维稳能力。

最后，增强联村党组织联习共训机制训用成果转化的稳定性。改善联系共训机制运行中出现的“训而不用”“训用脱节”情况，打造训用实操环境、建立训用效果反馈评价机制是切实可行的可选路径。一是打造训用实操环境。任何训用成果的转化都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环境，于联村党组织而言，组织、项目、活动都是承接联习共训机制成果转化强有力的载体，要充分调动这些载体资源为联习共训机制成果转化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持。一方面，充分利用联村党组织的组织阵地、各联建主体的工作基地，在联村范围内积极搭建合作项目，让多元联村主体能够真实的接触和进入这些合作项目，使其能够将培训项目中萃取的知识和习得的技能发挥到具体实践中；另一方面其，适当开展联习共训机制成果运用展示这类形式的活动，在联村党组织中举起互学互促的旗帜，让联习共训运行机制成果的转化和运用成为看得见、做得到的事情。二是要建立训用效果反馈评价机制。联习共训机制成果转化是一个渐次拔高的过程，检验这一过程需要建立训用效果反馈评价机制，以此作为及时发现联习共训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机制运行策略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联村党组织落地训后跟踪服务，要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训后导师制、训后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或以导师观察检验或以指标综合评估的方式充分反应训用效果。

5.5 加强利益共享机制的协调性

首先，畅通联村党组织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联村党组织多元主体利益表达渠道是实现利益共享机制协调性的前提，源于联村党组织利益表达信息流向的不同，通过纵横两个方向来保障联村主体的利益诉求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在纵向上提升利益表达路径的回应性。利益共享机制的核心是联村党组织能够平等地、持续地回应联村成员的利益偏好，尊重每一方联村

主体的利益诉求需要联村党组织不断提升对利益诉求的响应度。一方面，要全面加强联村党组织利益表达服务能力，以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为本位和宗旨，对利益表达制度体系内的每一种方式都一视同仁，不能因为联席会议制度、议事协商制度的公开性特征就泯灭信访制度的受理性；另一方面，要持续增强联村成员的利益表达能力，塑造其自我表达、自我革命的意识，使其以利益共享主体的角色参与到利益表达中。二是在横向上积极开发利益表达路径。通常情况下，联村党组织利益表达路径以“官方”制定的垂直渠道为主，即包含了联席会议制度、议事协商制度、信访制度在内的利益表达制度框架，这种纵向利益表达渠道具有固定化、常态化、时间久、见效慢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横向开发相关利益表达渠道。在众多联村党组织已经搭建起的线上网络交流平台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信息技术手段，线上开展利益表达活动，使利益表达信息能够快速向上流动，提升利益表达效率。

其次，优化联村党组织利益分配格局。改进联村党组织利益分配格局是促进利益共享机制协调性的应有之义，是维护多元联村主体利益分配公平，防止利益分配主体固化的关键。多地联村党组织利益分配的实践表明，坚持新集体主义、扩大利益共享点，能够使利益共享机制的整合、调节作用进一步显现出来。具体来说，一是要探索新型利益分配方式，保障多元主体获益地位平等。联村党组织是以项目合作、契约治理等多元业务联结多元主体的，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使得多元联村主体对利益分配方式的诉求愈发复杂化，现有以股权分配为主的利益分配方式不足以保障合作社、行政村及其村民等弱势群体利益，因此需要在保留既有股权分配的基础上探索新型利益分配方式，如契约分配法就是可行选择，这种分配方式对目前联村党组织发展不够成熟的现状有极高适配性，通过多元主体集体事先就利益分配的内容、分配的途径和违约分配等事项进行充分的讨论，进而为弱势主体的谈判机会提供可能。二是要丰富联村党组织利益分配的内容，推动利益全面分配格局形成。从广泛意义上来看，联村党组织利益分配内容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多面的概念，涵盖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生态利益、组织利益等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在确定利益分配边界时将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都充分考虑进去，另一方面要求在分配利益时以联村党组织的整体利益为前提，以多元联村主体的共同利益为核心，即不能出现因为个别主体的经济利益就放弃其他主体的政治利益、生态利益等。

最后，完善联村党组织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平衡是利益共享的一个重要理念，完善联村党组织利益补偿机制有助于弥合获益差距、缓解利益矛盾、实现利益整合，为此，可以从明确利益补偿主体和方向、注重利益补偿行为的连贯性予以优化。一是要明确利益受偿的主体。首先需要厘清多元主体在联村发展项目运行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多元主体的履职尽责情况、

受损情况等作为判断点，确定利益受损主体，重点关注那些产生了明显经济或生态利益损失的主体，如企业主体投入的大量资本、设备等未得到有效回报；行政村投入的生态成本等收益微弱，这些主体都应当成为受损主体的考虑范围。二是要探索横向补偿方向，实现纵横补偿相互协调的局面。发挥联村党组织多元主体间横向情感联系的优势，在联村区域内主体地位平等、权责对等的前提下，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鼓励受益主体与损益主体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转移支付、飞地经济等形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三是要注重利益补偿行为的连贯性。加快构建程序流畅、行为连贯的补偿机制需要较长时间，一方面，需要联村党组织在补偿政策、措施方面保持一定的连贯性，不搞大“换血”，尤其是在补偿机制迭代升级的过程中，要坚持试点探索、稳步过渡的原则；另一方面，要加强联村干部补偿工作执行力建设，细化补偿机制的工作流畅与责任，促使联村干部在补偿工作中主动作为。

5.6 加强运行保障机制的完备性

首先，加强联村党组织的经费保障力度。稳固的经费支持是解决联村党组织运行经费欠缺的关键，为满足组织运行的基本需要，联村党组织急需重新思考组织经费的支持模式和管理模式，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向加强组织经费保障力度。一是要扩大经费来源渠道。在经费来源的渠道上要改变以往单纯依靠上级党委“条条”式拨付的观念，尝试“块块”吸引资金投入，形成“条块结合”的投入与发展模式，具体来说，联村党组织要设置联村财政运行专项资金，一方面通过积极向上级片区联合党委争取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企业组织、合作社组织等多元主体集资联建的积极性，动员和接受其合法性投入与资助，合力增加联村党组织财政经费总量。二是要精细化管理组织财政资金。在经费的管理模式上要进一步精细化管理组织财政资金，这样有利于保障资金监督和促进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联村党组织在坚持“三个独立”管理原则的基础上，拓宽经费管理领域、细化资金管理守则，既要适当调整经费使用结构，合理预留抵御组织风险、激励联村干部等方面经费，又要将经费管理的高度上升至经费运营上，不断提升经费管理人员及联村党组织的投资意识与能力，促进经费管理由静态记录到动态运营的转变。

其次，拓宽联村党组织监督保障范围。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时刻检视着各个机制是否正常运行，审视着联村党组织任务完成的进度，完备其监督保障机制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既要解决监督主体构成狭窄的问题，又要解决监督课题内容狭窄的问题，以增强联村党组织监督保障力量。一是要增补监督主体，构建多元监督主体。积极探索联村党组织多元监督主体的协同合作模式，一方面，应该赋予联村干部、联村成员、联村区域内村民等主体以平等的监督权，实现组织内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与组织外社会监督贯通协调的监督模式；另一方

面，多元监督不等于不分主次的监督，发展多元监督力量的过程中必须要理顺各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向和监督内容，避免造成监督监督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浪费。二是要扩大监督客体的范围和精准性。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扩大监督客体的人员对象，将联村党组织内的全部成员都包含进去，另一方面要扩大监督客体的范围对象，即要在对被监督者经济发展能力履职甄别的基础上，还要将其在组织运行中的思想政治、文化生活、生态文明等方面都纳入监督范围。

最后，设置清晰明确的联村干部考核评价标准。清晰明确的联村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是检验联村干部履职情况的有力保障，具有“监督”“预警”“激励”“问责”的重要作用。建构一套长期可行、务实管用的联村干部考核评价标准应当以其标准的客观性、可比性和综合性三方面入手。一是考核评价标准的客观性。要使联村干部考核评价标准具有客观性，就需要在评价行为产生前制定好相关标准，要秉持客观反映联村干部工作真实状况的原则，广泛征求片区联合党委、联村干部、联村党组织成员等各界意见，在联村工作参与度、联村党组织经济创收情况、联村党组织项目促成率等方面设立硬性指标，将这些制定好的考核评价标准成为一致认可的客观性标准。二是考核评价标准的可比性。考核评价标准的可比性要求在联村党组织干部考核评价标准的构建中，依据组织特色、岗位特色建立具有区分度的指标，防止在考核评价工作中出现“你好我好大家好”“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的现象出现，为考核评价的“激励”和“问责”工作奠定基础。三是考核评价的综合性。彰显联村干部考核评价标准的综合性需要在标准设计要坚持过程导向式考核评价和结果导向式考核评价并重，围绕联村干部工作职责问题，按时空顺序把考核评价标准划分为彼此相互独立又具关联的评价标准，以便能够更为全面的对联村干部开展考核评价工作。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集(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6.
- [4]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5.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9]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0] 袁鲁,龙力莉.《新时期新任务新思路:党的基层组织创新案例与实务指南》[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0.

[1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基层党组织如何提升组织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2] 肖纯柏.《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途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利》[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14] 陈红运.《党政组织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5] 云南农村干部学院.《乡村组织振兴基层实践》[M].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

[16] 裴泽庆.《组织强党》[M].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

[17]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3.

[18]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16.

[19]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1.

[20]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3.

[21]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4.

[22]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

[23] 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50.

[24] 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4.

[25] 邓小平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8.

[26]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48.

[27] 邓小平文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3.

[28] 邓小平文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3.

[29] 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38.

[30] 江泽民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5.

[3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32]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

[33] “四个全面”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82.

[34] 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579.

[35]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51.

[36] 张立文.和合学与文化创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05.

[37] 张希宇.墨子新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

[38] 曾振宇.孟子新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

[39]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75,唐,阮元校刻本.

[40] 陈一平.淮南子校注译[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355.

[41] 邵文辉.求大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5.

[42] (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3] 赖先进:论政府跨部门协同治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2.

[44]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115.

[45] 王洪树.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4.

(二) 期刊文献类

[1] 陈晓宏.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模式创新——以福建省三明市“跨村联建”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2):46-53.

[2] 崔永龙.沿河自治县板场乡推行村党支部联建的有益探索[J].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8(1):66-68.

[3] 张宇.基层党组织创新形式——联村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J].党史博采:

下,2013(12):35-3539.

[4] 杜志雄,赵黎,崔红志.跨村联建、村企共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探索[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26(01):95-103.

[5] 赵黎.以联村党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J].经济研究参考,2022(2):13-22.

[6] 田毅鹏.“联村发展”:乡村振兴推进的新趋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5):32-38.

[7] 董江爱,张瑞飞.联村党支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方式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0(2):60-66.

[8] 咸鸣霞,周义程.市场合作、民间协调与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创新——基于联村党建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05):90-98.

[9] 李想,何得桂.制度同构视野下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制——基于“三联”促发展工作实践的分析[J].党政研究,2022(4):72-83.

[10] 陈宝玲,陈美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跨村联建”党建模式实践探索——以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为例[J].领导科学论坛,2022(09):56-59+85.

[11] 殷焕举.新时代村级党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J].中州学刊,2021(3):12-17

[12] 赵洁,陶忆连.乡村振兴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1):16-21

[13] 胡国富,周松强,何中伟.“区域化”联村机制在义乌市的探索[J].江南论坛,2013(06):39-40.

[14] 冯川.“联村制度”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以浙东 S 镇 M 村的实践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02):38-48+154.

[15] 梁新芳.全域党建: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模式[J].中州学刊,2021(12):13-19.

[16] 尹学朋,任中平.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新模式——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村企联建”的实践与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8(03):71-73.

[17] 文丰安.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百年历程、鲜明特色及现实启示[J].中国农村观察,2021(04):32-49.

[18] 王美英.联村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以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的“1+X”联村党建为例[J].农村·农业·农民 B,2022(5):34-36.

[19] 李强.福建龙岩永定区:“跨村联建”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J].党建,2022(07):57-59.

[20] 孙林.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的路径探析[J].理论视野,2021(06):79-84.

[21] 何得桂,刘翀.党建势能:基层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以陕西 H 县党建“三联”促发展为例[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24(02):12-23.

[22] 曾薇.战略衔接期乡村产业协同治理的驱动力、结构与路径研究——以凤镇 M 村“国企联村”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4):481-490

[23] 王灿灿.多村兼并治理的区域化联村模式探索——以浙江省 X 市的农村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8-51.

[24] 曹子玉.联村党组织——农村基层组织设置的新探索[J].党建研究,2006(11):61-62.

[25] 苏秀瑞.以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山西省阳泉市郊区组建联村党委的探索与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0(12):83-85

[26] 张丽萍.“联村党委”新模式的可行性研究[J].新西部,2019(29):65-66+18.

[27] 何得桂,韩雪.引领型协同治理:脱贫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基于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实践的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24(04):67-77.

[28] 岳奎,张鹏启.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探析[J].行政论坛,2022,29(03):82-89.

[29] 李勇华.联村社区治理的若干问题论析[J].中州学刊,2014(3):5-11

- [30] 徐根义,蒿艾莉.创新组织设置,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格局——诸城市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实践及启示[J].理论学刊,2010(05):25-31+127.
- [31] 瓦标龙.实施“五联五共”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J].党建研究,2020(8):59-60.
- [32] 刘成良.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 H 镇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106-112+159-160.
- [33] 田先红.联村制度与基层政府动员——基于浙江省 A 县的经验研究[J].长白学刊,2019(05):92-100.
- [34] 王和余.支部跨村建一柱擎起天——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探索党支部“跨村联建”的调查与思考[J].新长征,2011(7):58-59
- [35] 胡华.村社联建模式的运行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J].湖南农业科学,2022(6):93-96.
- [36] 高强,孔祥智.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四川彭州小鱼洞镇“联营联建”模式的案例分析[J].东岳论丛,2020,41(09):162-171+192.
- [37] 裘曙洁,张亚君,陈海存.乡村振兴中加强基层党建联合体建设研究——基于“滕头区域”党建联合体的考察[J].江南论坛,2018(6):9-11.
- [38] 丁岚.联村党委工作机制在“三变”改革中的探索——以娘娘山联村党委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9(13):42-43.
- [39] 耿步健,张岩.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根基[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2):1-9,22.
- [40] 张序,张霞.机制:一个亟待厘清的概念[J].理论与改革,2015,No.202(02):13-15.
- [41] 熊光清,蔡正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内涵——结构、规则和关系层面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1,No.311(06):1-10+195.
- [42] 李辉.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的新飞跃[J].探索,2021(5):92-102.
- [43] 叶敏.联村干部:基层治理体系的人格化运作[J].中国行政管理,2022(4):105-111.
- [44] 王晓毅,杨蓉蓉.能动性:驻村帮扶的角色与空间[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03):111-122.
- [45] 宋雄伟,刘娜.论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形成机制——基于“组织领导—吸纳整合—监督保障”的分析框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No.157(03):44-51.
- [46] 马明冲.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论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8(1):12-20.
- [47] 赵子龙,吴维旭,黄斯嫻.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基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案例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3,16(01):70-87+198.
- [48] 张茂元,黄玮.资源依赖中的社会组织同构分析——以社会组织党建实践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51(03):84-93.
- [49] 李尚旗.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5(9):161-165.
- [50] 邱新有,邹菲琼,王丽华.论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6):79-87.
- [51] 谢治菊,范嘉雯.驻村干部考核:要素、功能与优化[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1):100-110.
- [52] 冯连军.习近平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J].理论视野,2021(04):34-40.
- [53] 贺东航.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脉络和重要制度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05):49-58.
- [54] 徐凤月.新时代网络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实践梗阻及优化路径[J].中国矿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3):49-60.

[55] 陈晓晨.责任意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结合的纽带[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03):24-25.

[56] 赵桂英,田雪梅.论新时代领导干部责任担当意识的强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08):35-37.

[57] 叶婧,陈刚,薛天等.“强弱村联姻”培育乡村新动能[J].瞭望,2018(22):35-36.

[58] Saglie J. Do party organizations integrate multi-level states? The case of the Norwegian Local Government Reform[J].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020, 30(4): 579-597.

[59] Aarebrot, Erik, and Jo Saglie. "Linkage in multi-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role (s) of Norwegian regional party branches."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3.5 (2013): 613-629.

[60] Dickson B J.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M]//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 Vols. Set). Brill, 2017: 949-977.

[61] Hjaltadóttir R E, Makkonen T, Mitze T. Inter-region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Does being a rural, or border region, or both, make a differ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4: 257-270.

[62] Farid M, Song C. Public trust as a driver of state-grassroots Ngo collabor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5(4): 591-613.

[63] Christensen T, Ma L. Coordination structures and mechanisms for crisis management in China: challenges of complexity[J]. 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 2020, 20(1): 19-36.

[64] Krishna A. Partnership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s: exploring the scope for synerg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3, 23(4): 361-371.

[65] Panday P. Making innovations work: local government-NGO partn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Bangladesh[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18, 28(1): 125-137.

(三) 政策文件类

[1] 中共中央办公国务院办公室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23/content_5691881.htm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22/content_5706403.htm

[4]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02/content_5615053.htm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7]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9/01/content_5426319.htm

[8]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9/content_5366917.htm

[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12/14/content_5731828.htm